

“中国式现代化与欧洲模式”笔谈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目标。如何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国内学界热议的话题。本刊立足于中国的视角，邀请四位资深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与欧洲模式、欧洲的战略自主与欧洲的未来、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以飨读者。

中国式现代化、欧洲模式与中欧关系*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论述，提到了中国到 2035 年的发展远景和未来五年的具体任务，特别是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就中国对外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很全面的概念，共提出八个目标：经济和技术的高质量发展、国际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显著改善、国家安全的巩固，以及中国在地上地位的提高。^② 上述目标的实现，与外部世界相关的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或普遍性特征。习近平主席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的会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③ “共同特征”既包括高水平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如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又有信息化和智能化，以及应对产业转型对社会和自然的冲击的方式方法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从外部世界学到了很多，也与世界分享了不少，并且会继续与外部世界交流互动，学习先进的外部经验。

*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 2022 年年会”上的致辞，经本人修改而成。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② 同上文，第 25 页。

③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11/04/content_5724700.htm。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要植根于自己的国情,要坚持中国的特色。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脆弱的自然环境,资源分布也极不均衡。然而,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一系列由此产生的政策纲领,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特色,也与世界文明相对照。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存在差异,需要用差异化的方式解决现代化在中国提出的问题,各国的现代化方式不可能强求一致。当然,在差异性中仍然存在相互性,例如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也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必然是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是中国特色,特别是建构在对西方民主制度反思的基础上,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制度特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形成的过程中,也必然凝聚全人类对民主道路的探索。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拒绝“修昔底德陷阱”逻辑。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资源在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在全球范围内合理优化配置,需要各种合作和交易在合理公平的规则下进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也惠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致力于扩大世界各国的公约数,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一步而言,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述,要把中国的未来发展蓝图与中国具体的外交政策相衔接,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对外政策要点:(1)坚持主权平等和多样性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2)扩大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促进平等、开放、合作、互利、互信和利益融合的伙伴关系;(3)继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4)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①

以上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对外政策的原则性阐述。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不是西方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去实现的,而不是一方打压另一方的口号。当然,在当前的形势下,世界还需要认真地去面对并遏制零和博弈和强权政治的日益增长,因为这股逆流是干扰甚至阻碍人类进步的势力。国际社会需要坚持扩大共同利益,坚持包容共济、团结一致,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而不是一味追求在对抗中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60-63页。

你输我赢。

我们学习中共二十大报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总是会有一个参照系的,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欧洲。我们会问,什么是“欧洲式的现代化”呢?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讨论“欧洲转型”,那么欧洲是从什么样的形态转型的呢?欧洲是否也像中国一样,存在某种独特的模式和特性?欧洲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开始了转型进程?其转型的方向和方式是什么?最后,我们应当如何与正在转型的欧洲打交道?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国内欧洲学界在大约 20 年前就已开始讨论欧洲特性或欧洲模式,有过初步的看法。简而言之,欧洲模式是一种多领域、多功能、由多种权力组合方式构成的矩阵模型。在安全领域里,欧盟是个“侏儒”,它的安全模式就是依靠美国的保护伞、躲在美国指挥棒下的北约里。在北约内部,欧洲有各种不适,但无力独立出来,行动也不自由。在经济社会领域里,欧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分配占比较大,是一种兼有社会国家和欧盟市场的体制,在全球化中既有自由主义成分,也有保护主义特点。欧洲的自由竞争是符合欧洲利益规则的自由竞争,如索拉纳在匈牙利中欧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欧洲要保证自己坐在驾驶的位置上,而不能做后座上的乘车人”。^①也就是说,欧洲要掌控车的行走方向和方式,不能被别人带着走,需要参与并主导竞争规则的制定。过去的欧洲的确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在政治领域里,欧洲与美国同根同源同价值观,如推行竞争性政党政治、普选式民主、三权分立、政权轮替等。但欧盟层面的政治游戏规则与成员国存在差异。成员国层面更多的是民选政治,更受民意左右,而欧盟层面更多的是精英政治,擅长并热衷于所谓的协商式民主和技术官僚体制。在外交领域里,欧盟和民族国家既相互利用也相互制约,“用一个声音说话”一直是欧盟外交发展的目标,而非现实。

当然,欧洲模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在不断地变换、创新和转型,并且在创新和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身的发展逻辑。但是,21 世纪以来欧盟的创新和转型更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挤压,内生性的动力正在缩小。近十多年来,来自外部的冲击力加大,并且几乎没有间断,迫使欧洲一直处于各种危机的漩涡中。2008—2009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挑战了欧洲的经济增长模式;2010 年后的难民危机挑战了欧洲的社会团结模式;2013 年的乌克兰危机凸显了外交领域里价值观的作

^① 引自笔者参加的索拉纳(欧盟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2010 年 11 月底在匈牙利中欧大学(CEU)的演讲。

用;2015 年的恐怖袭击危机挑战了欧洲的多元一体、民族融合和社会治理能力;2016 年的英国脱欧挑战了对欧洲一体化前途的信心;2020 年的新冠疫情冲击考验了欧盟双重治理的有效性、民众的团结、公共财政能力以及关键产品的供应等;2022 年的俄乌冲突爆发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更是使欧洲经济遭受重创,甚至直接威胁到欧洲的经济命脉,大幅度提高了欧洲制造业的成本,甚至影响了欧盟的发展方向。

在应对不断的危机和挑战中,欧洲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型?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大参与方,欧盟长期以来将经济力量作为对外示强的工具。而欧盟自 21 世纪以来的 GDP 全球占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受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欧盟前途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欧盟对于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大国竞争的格局并没有做好准备,从而进入战略摇摆期。所谓“欧洲战略自主”和“主权欧洲”的提出,恰恰表明欧洲存在战略焦虑,需要凝聚力量,甚至产生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感,表现在对外政策领域里,就是失去欧洲一体化早期的那种坚定和自信。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欧洲对于一些主要的问题都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位,例如,俄罗斯到底是欧洲主要的能源来源国,还是欧洲最大的安全挑战者?中国到底是欧洲繁荣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和竞争者,还是系统性的对手?特别是如何对待美国,欧洲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美国的持续保护?在哪些方面可以摆脱美国的制约,实现战略自主?在这些重大战略问题上,一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前,欧洲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举棋不定的。

面对变动和未知的外部世界,欧洲采取的应对措施,概括而言就是坚守(韧性)与创新,也就是在欧盟文件中常常出现的“韧性”(Resilience),即坚守欧洲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同时使其具有适应力和生命力;转型(Transformation),是指在关键领域里创新提升、突破困境。韧性偏重于上层建筑,而转型是体现在各个基础领域里的具体的政策措施。

我们可以从五个领域考察欧洲的转型:一是经济领域。其转型是数量和质量并重,体制和社会并行,需要技术、体制和社会相互协调,也需要高层的投入和治理创新。经济体制转型和创新是欧盟擅长的领域,它一直都在强化对经济和财政的管理(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复苏基金等制度创新)。在经济状况好的情况下,欧盟创建的新机制、引进的新方法比较容易实施,但在经济发生困难、成员国利益冲突较大的情况下,就难以达成妥协,成员国也不愿轻易地将权力继续上交给欧盟。俄乌冲突对欧洲经济转型的冲击力是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地位的突然上升挤压了经济体制转型的空间,在事关欧洲工业经济命脉和竞争力存续的能源政策方面,成员国的步调难以一致,欧盟忙

于协调各国在对俄制裁方面的立场,在最关键的经济技术转型领域的投入则相应减少,必要的转型被迫滞后。

二是数字化领域。其转型是欧盟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也是欧洲经济转型的关键。自2020年起,欧盟密集发布多份文件,例如《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新工业战略》《欧洲数据战略》《人工智能白皮书》《2030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等,就是为了能够领导数字转型进程。数字转型的成功与否不仅涉及技术的掌握、政策的倾斜以及对企业的扶持等,还涉及经济社会等层面。若不能将数字就业能力和岗位进行提升,数字转型也无法实现。因此,数字转型涉及一揽子的方案。欧盟可以提出数字转型,但其所需的就业和社会投入主要在成员国层面,所以数字转型也需要成员国的认同和配合。

三是绿色领域。这是欧盟的优势领域,也是其提高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重点领域。欧盟启动了包括政策制定、技术换代、产业转型、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建设在内的系统性工程,称之为“绿色新政”(Green Deal)。不过,若要实现“绿色新政”的目标,欧盟必须强化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因为实现绿色目标是全球性问题,而不仅仅是欧洲问题。没有国际合作,欧盟自身也走不远。此外,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使得成员国不得不专注于寻找能源供应方,绿色转型被迫受阻。因此,外部环境对欧盟绿色转型的冲击非常大。

四是政治转型。它是悄然发生的,欧盟的政治发展目标已经开始调整为差异性一体化和“多速欧洲”,但是难民危机和俄乌冲突这样的外部冲击挑战了欧盟内部的政治稳定性,激化了极端势力。虽然意识形态化趋势使欧洲暂时在政治上达成表面的一致,但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在大小成员国之间,在东西南北欧之间,分歧正在加大,分化也正在形成。

五是外交转型。欧洲政治家有一句口头禅:“若欧洲不成为玩家(player),就会成为角逐场(playground)。”^①目前的欧洲恰恰成为角逐场,要承受外来角逐者带来的无妄之灾。身为角逐场的欧洲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外交趋向:一是向地缘政治回归,如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宣布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是“注重地缘政治的委员会”。^②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个趋向更加明显,而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地缘政治的规则和欧

^① “EU Must Be a Player and not a Playground, Argues Mr Michel,” Europe Daily Bulletin, No.12559, 15 September 2020, <https://agenceurope.eu/en/bulletin/article/12559/1>.

^② 《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发挥领导力》,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911/20191102915555.shtml>。

盟一贯奉行的一体化规则并不相同,那么欧盟要舍弃一体化逻辑去迁就地缘政治逻辑,不就是历史倒退吗?二是收紧贸易和投资政策,使其与政治挂钩,即经济 and 外贸政策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安全化方向转变。例如,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共设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以价值观同盟协调未来全球经贸规则标准的制定。设立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防御性贸易政策,就“外国政府补贴”设立新规,建立新审查制度等,表明欧盟各项涉外经贸政策出现意识形态化倾向,对外商贸也捆绑价值观和安全观条款。例如,2022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公司可持续性尽责指令提案》(或称“供应链法”),要求受欧盟国家管辖的企业(含直接或间接商业联系的上下游全产业链环节)提供人权、环境、良治等方面的信息。这些分割世界市场、设置贸易壁垒的做法,相较于早期更加自由的欧洲共同体来说,也是一种历史倒退。三是滥用制裁工具。欧盟2021年3月对华实施制裁之后,又频繁使用制裁工具,最后在对俄制裁中受到严重反噬。对于擅长外交斡旋、精于求同存异、创造过和平机制的欧洲共同体而言,绝对不是进步之举。

虽然欧洲早些年就已在外部势力的挤压和外来威胁的碰撞下开始艰难地走上转型之路。但欧洲转型的核心一直是强化自身体制机制,提升战略自主,推进技术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采取主动,力争不被甩到“汽车后座”上。但最近的转型却滑向了另一个方向,就是重塑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缩短产业链供应链,突出区域化特征,改变全球化走向。这些转型的取向明显夹杂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特色,并不符合欧盟自身的利益。

俄乌冲突对于欧洲转型起到了搅局的作用,一方面打乱了欧洲转型的阵脚,另一方面推动了逆向转型加速。首先,必须看到,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安全模式迅速启动。这种安全模式体现为对美依赖加深,战略自主缺失或被搁置;确立与美国站在同一条战线的政治立场强化了意识形态化倾向,无法把握自身发展前途的危机感和战略焦虑感加重。欧洲的根本利益,如经济竞争力和国际规则制定权,都受到挑战。随着能源来源的变化,欧洲经济格局也要随之转型,能源作为工业化欧洲最基本的成本要素的提价,意味着欧洲竞争力进一步遭受重创,很多比较优势消失。美国随意加息促使美元回流,又造成欧元疲软、市场对欧元信心下降,打击了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做紧跟美国的小兄弟”这种国际角色对于力推战略自主的欧洲来说非常难堪。即使欧洲民众反俄情绪高涨,也改变不了俄罗斯不可能被清除出世界版图的事实。当情绪回落,需要就冲突拿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正常理性的欧洲政治家和战略家都不会将“血战到底”作为选项。重建欧洲的战略平衡,而非传统的地缘对立才是欧

洲的出路。由此,我们既看到欧洲缺乏战略自主权的尴尬处境,也看到欧洲转型的退化方向和方式。

在欧洲转型的背景下讨论中欧关系,我们需要更广阔的视野,需要了解欧洲的战略摇摆与战略无奈,了解民意的可变性及其在欧洲决策中的地位,认识媒体戏剧化、片面化、歪曲化、极端化事实的特性和驱动力。我们要看到欧洲是冲突的受害者,看到欧洲人对战争伤害的历史记忆,不能被西方媒体和个别智库的片面甚至恶意报道左右我们的理性思维,在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是光明大道的同时,也要相信欧洲人对于欧洲式现代化的艰辛努力与付出并非为了与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长期对立。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欧洲的现状与处境,也要研究美国因素对于中欧互信降低的影响,了解新冠疫情对中欧相互了解和理解鸿沟的加深和加宽,从而找到对欧政策的关键抓手,有针对性地加强中欧关系的积极面。

中共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阐述是:坚持主权和多样性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扩大各国利益交汇点,促进平等、开放、合作、互信、利益融合的伙伴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①中国反对零和博弈和强权政治,这些原则也将体现在中欧关系和对欧洲政策中。具体而言,第一,确立中国自主发展与欧洲共同发展相关联是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对欧关系的立场是求同存异,努力排除双边关系中的逆流和干扰,加大现实领域的合作,而非突出差异、挑动对立。第二,中国与欧共体和欧洲国家在“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原则指引下,从长期的战略角度调试双边关系,收获不同社会制度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平等合作带来的益处。历史经验证明,长期的战略对抗不符合任何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谓的系统性、制度性差异,不是也不应是双边关系的障碍。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信仰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因此需要设法扭转中欧间的错误定位和误判,尽最大可能创造共同利益。第三,要同欧洲一道向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而非历史后退的方向增进合作,在全球治理和第三方合作方面有所进展,在气候变化、贸易便利化、共同安全、防疫、减少文明冲突等全球性问题上寻求合作,妥善解决相互之间的错误认知给中欧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建立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模式。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60-63页。